

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與 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Strain Theory, Deviant Peer,
Low Self-Control, and Onset of Delinquency

譚子文*

Tzyy-Wen Tan

張楓明**

Feng-Ming Chang

(收件日期 100 年 7 月 25 日；接受日期 100 年 9 月 22 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緊張、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等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聯性。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以臺灣之八所國中共 734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採用巢式迴歸分析技巧分析所得數據資料。研究結果顯示：1. 緊張因素中之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具有影響效應；2. 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存在著關聯性；3. 家庭經濟情況、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預測，存在著交互作用效應。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建議。

關鍵詞：偏差行為、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大同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in, deviant peer, and low self-control were related to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linquency. This study used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data from 734 students in eight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Method of nested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1) negativ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nega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linquency; (2) deviant peer and low self-control were related to delinquency; (3) there wer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negativ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and negative peer relationships on delinquenc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study also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Delinquency, Strain, Deviant Peer, Low Self-Control

壹、前言

根據 Agnew 一般化緊張理論 (General Strain Theory)，舉凡與他人的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目標受阻、生活困擾、負面刺激等皆可能使個體產生憤怒、挫折感、敵意等負面情緒 (Agnew, 2001, 2006; Robert, Susan, & Jennifer, 2000)。這些緊張、不愉快的情緒會驅使個體採取行動面對，若無法透過合法的途徑消除因緊張所引發的負向情緒，個體將可能採取非法或犯罪的手段加以因應 (Broidy & Agnew, 1997; Broidy, 2001)。Agnew(2001, 2006: 36-38) 進一步指出緊張會促發個體的一些負面感覺而產生偏差行為，亦會暫時的降低個體自我控制程度，促發犯罪的社會學習情境導致犯罪或偏差行為。換言之，緊張因素和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間，尚受到一些制約因素的影響 (Brezina 1998; Carson, Sullivan, Cochran, & Lersh, 2009; Kaufman, 2009)，如偏差同儕 (Agnew & White, 1992)、自我控制 (Agnew, 1995, 2006; Agnew, Brezina, Wright, & Cullen, 2002; Baron, 2004; Colvin, 2000; Hay & Evans, 2006; Hay & Forrest, 2006)、社會學習 (Lin, Cochran, & Mieczkowski, 2011)。

誠如前述，當個體在面臨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等社會緊張因素時，一旦適應不良無法承擔壓力與挫折時，若再加上自我控制能力之不足，及接觸偏差友伴，更是增加了其發生偏差行為的機會。但是相較於國外對一般化緊張理論之驗證，國內甚少有較完整、系統化之檢驗制約因素在一般化緊張理論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成因解釋的實徵性研究。因此，本研究將依據一般化緊張理論、接觸偏差同儕及自我控制理論之觀點及相關實徵資料，探討影響國中生偏差行為形成之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因素為何；並以巢式迴歸分析方法檢視各變項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係與影響效應，以釐清各變項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情形。據此，本研究試圖提出一涵蓋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因素之架構，以解釋其與國中生偏差行為形成之關係與影響。並提出一個較整體的觀察，希望能對國內此一有所缺漏的實徵研究領域略具補綴之功，以作為未來研究與學校輔導工作的實務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緊張因素

Agnew (1992, 2001, 2006) 一般化緊張理論認為個體偏差行為的形成，是因為處於負面影響狀態 (negative affective states)，當個人經歷緊張或壓力經驗時，會產生憤怒、挫折與不公的負面情緒，導致一個人產生偏差的可能性。這種負面影響狀態可以是被虐待、疏忽、犯罪被害、體罰、家庭生活、學校生活挫折，以及有壓力的生活事件等 (許春金, 2010; Agnew & White, 1992; Brezina 1998; Hoffman & Miller, 1998; Wills, Vaccaro, & McNamara, 1992)。而此種緊張的來源，Agnew (2009) 認為可被區分為三方面：(1) 未能達到正向價值的目標，包含：抱負與期望成就的落差、預期的成就與真正達成的成就有所

差距，以及認為公平的結果與實際的結果有落差。這些情形都會造成青少年的挫折與憤怒的情緒，若個人無法用合法的手段紓解差異造成的緊張與不安感時，則可能以偏差行為作為改善差距的手段。(2) 失去正向的刺激，當個人生活中所喜歡之人、事、物消失，離去或破壞時，皆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而導致緊張與負面的情緒發生。此時若未能找到正當途徑適時加以紓解，便容易產生衝動的攻擊行為或是消極的逃避行為。(3) 面對負面刺激，生活中負面刺激是指發生令人焦慮不安的事情。例如學校生活壓力、受虐、暴力受害者、親子關係不良、受同儕排斥等。當個人遇到上述情形時，若無法使用有效策略或方法來減輕此挫折感與不安，則極易採取直接或間接對負向刺激來源做反擊，或是使用逃避的手段加以逃離。

承上所述，兼以實徵研究發現，不利的家庭環境及負面的生活事件，與藥物濫用、攻擊行為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青少年偏差行為有著關聯性 (Agnew & White 1992; Rhodes & Jason, 1990; Wills et al., 1992)。因此，本研究依據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觀點，參酌譚子文、范書菁 (2010)、譚子文、董旭英、葉雅馨 (2010) 的研究，歸納出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等三項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相關之社會緊張因素，分述如下：

(一) 與他人負面關係

Agnew 認為當個人處於負面刺激愈多，刺激的強度愈大時，對於其產生偏差行為的影響愈大。研究顯示，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若長期處於負向關係 (王淑女，1994；葉在庭，2001；廖經臺，2002；Agnew, 2001)、日常生活中同儕的排斥 (Broidy & Agnew, 1997)，及學校裡老師的疏遠、拒絕 (許春金，2010；黃芳銘、楊金寶、許福生，2005)，亦即與父母、同儕及老師的負面關係，是導致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重要危險因子 (Agnew, 1992; Lau, Qudarel, & Hartman, 1990)，而且男生比女生有著較高的負面關係，與同儕的關係上更是缺乏親密自然的友誼 (Agnew & Brezina, 1997; Mazerolle, 1998)。據此，本研究將與他人負面關係歸納為與父親、母親、同儕及老師的負面關係等四類。

(二) 負面生活事件

Agnew 認為當個人無法使用合法的方式，避免或降低挫折感及焦慮等情緒時，便會產生偏差或犯罪行為。據此，一旦青少年遭逢與面對學校生活的不順遂；受到班上同學的嘲弄、欺負；親人亡故、父母離異、失戀、好友病重，以及父母親失業或家中經濟發生困難時，將使其受到負面影響，造成青少年緊張、焦慮的情緒，進而產生挫折與壓力，則此將易導致偏差行為。Agnew (2006) 指出，青少年減少曝露在負面事件和關係的情境下，在成人時期會經歷比較少的緊張。實徵研究顯示，青少年若經歷過多的負面生活事件，會增加其藥物濫用行為、攻擊行為或其他各種偏差行為發生的風險性 (Agnew & White, 1992; Brezina, 1998; Hoffman, Cerbone, & Su, 2000; Wills et al., 1992)。

(三) 日常生活困擾

一般化緊張理論認為日常生活中若有某種緊張來源使得個體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威脅，

則此一壓力往往使人感到身心不適。如此一來，個體必須付出額外的精力以保持其身心平衡狀態，若個人又無法使用合法的方式，避免或降低挫折感及焦慮等情緒時，便會產生偏差或犯罪行為 (Agnew, 1992, 2006; Broidy & Agnew, 1997; Broidy, 2001)。換言之，青少年在生活中所遭遇到困擾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勢必影響青少年原本連續和穩定的生活，迫使他們做出改變以因應心理上的壓力。黃家珍 (1999) 的研究即發現，青少年經歷愈多的負面生活事件，如課業、人際關係 (江靜宜, 2009) 或外貌 (陳淑娟, 2008) 等，則其在日常生活困擾愈多，負面情緒也高。其他實徵研究結果亦發現，日常生活困擾都與偏差行為或犯罪行為的發生有的關聯性 (董旭英, 2003; Hoffman & Su, 1997; Robert et al., 2000)

由以上文獻探討可知，當個體的緊張經驗愈多、強度愈強時，對於犯罪及偏差行為的影響效應愈大；其次，每一類型的緊張均可能導致負面情緒的發生，例如恐懼、生氣、焦慮、挫折、失望等，個體為降低負面情緒所造成的心理負荷，有時就會以違反社會規則的方式來解決，如犯罪或偏差行為。因此，本研究即以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納入為國中生主要緊張因素來源，以探討國中生的主要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的關聯性。

二、接觸偏差同儕

社會學習理論假設人類的行為都是從社會互動過程學習而來的，暴力、偏差或犯罪行為亦是經由不良的社會化過程學習而來。換言之，青少年是透過具有暴力行為的同儕團體，學習到暴力行為之態度及技巧 (Akers, 1997; Burgess & Akers, 1966; Sutherland, 1947)。然而在犯罪學理論之競合過程中，有關犯罪性是否會隨時間改變，或社會學習因素是否確實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爭論中 (Akers & Sellers, 2009; 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偏差同儕的效應經常是理論爭辯過程的核心，也突顯了偏差同儕在青少年偏差行為中的重要性。儘管偏差同儕並非導向青少年走向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唯一因素，卻是少數能藉由與其他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間接或直接影響青少年行為的因子。而研究也指出，接觸偏差同儕與犯罪或偏差行為之間具有強烈關聯性 (Akers, Krohn, Lanza-Kaduce, & Radosevich, 1979; Warr, 2002)。此外，同儕間的青少年次文化，係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套思想、行為及規範。同時也是他們相互認同，及學習仿效的標準，尤其當有偏差行為的青少年能夠在其互動成員中獲得認同及支持時，偏差行為更容易被模仿。因此，獲得同儕的認同感及模仿同儕的行為，可以說是青春期間青少年的主要特色。Thornberry 與 Krohn (1997) 即指出，與偏差同儕相處會增強少年偏差行為，更是少年犯罪研究最有力的發現之一。

Akers (1985) 認為人們學習社會行為乃是透過直接的操作制約或模仿他人的行為而養成。養成的行為因獲得獎賞和避免懲罰而受到強化，但卻因受到懲罰和獎賞的喪失而減弱 (Akers et al., 1979)。Bandura (1973) 指出，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其行為是透過觀察和模仿社會情境中的個人或團體學習而來的。也就是說，青少年會經由和同儕的「社會比較」 (Buunk & Gibbons, 2007)，進而對同儕觀察、模仿的「社會學習」，使得同儕對青少

年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青少年若經常與犯罪或偏差青少年接觸，不但能學習到犯罪的技巧，且能增強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的動機、內驅力、合理化及態度。吳芝儀 (2000) 的實證研究顯示，學校裡的負面事件，易將學生推出校園，且經由同儕朋友等管道，模仿學習到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最快手段。由此審之，他人的偏差行為可以是一種示範作用亦是一種楷模，透過觀察、行為合理化 (justification) 及差異增強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等要素的互動，使得青少年在此過程中習得自己所要表現的行為。Sutherland (1947) 出個人的犯罪行為、動機及技巧的獲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是由非犯罪者經由接觸犯罪者的過程中習得，而個人若與犯罪者接觸次數愈多，愈容易犯罪。Agnew (2001) 亦指出與偏差同儕的接觸可能會導致緊張及反社會行為的發生。此外，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會隨著與偏差同儕接觸之頻率 (frequency)、持續 (duration)、優先性 (priority) 和強度 (intensity) 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亦即當青少年與犯罪或偏差模式的接觸愈頻繁，其行為所受的影響也愈大。換言之，青少年之所以會持續從事偏差行為，是因偏差之結果給予其增強之故，反之，當青少年不適當行為受到處罰或負增強，則有可能停止偏差行為。

由以上的探討可知，青少年常與不良同儕接觸，將會對其行為模式、認同的規範準則產生莫大的影響，容易以習得偏差行為的反應模式作為生活上不如意的對抗。再者，接觸偏差同儕與緊張之間亦具有關聯性，甚可能會加強青少年本身偏差行為的頻率、強度及持久性。準此，本研究將接觸偏差同儕納入共同分析，探討其對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關聯性的影響究竟為何。

三、低自我控制

Gottfredson 與 Hirschi (1990) 提出「一般化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以「低的自我控制」來表示缺乏社會控制的一種型態。他們認為大部分的犯罪者是缺乏對長遠後果的預期，行事欠缺事前計劃，只想即刻滿足當下的需求（亦即自我控制程度低）。具低自我控制特質者通常具有較高的求樂衝動性、喜歡從事刺激、危險的活動，不顧安全考量，注重短期利益而不願長期付出，也由於犯罪行為可提供立即性的酬賞，再加上低自我控制者易有犯罪傾向，因而低自我控制者也易於在犯罪的誘惑下產生犯罪或偏差行為。因此，Gottfredson 與 Hirschi 認為低自我控制者具有以下六種特質：衝動的 (impulsive)、漠視性 (insensitive)、力量性的 (physical)、冒險性 (risk-taking)、短視的 (short-sighted)，以及非語言性的 (nonverbal)。換言之，低自我控制的個體，可能會作出衝動的決定，喜歡簡單和容易的活動，沉溺於身體的享樂而不是精神的報償，勇於嘗試冒險、刺激的行為，把重點放在自己身上。正因為存在著這些特點，低自我控制的人可能忽視他們所作的決定對自己或他人長遠的影響 (Higgins & Boyd, 2008)。

國外眾多應用 Gottfredson 與 Hirschi 一般化犯罪理論的研究均指出，低自我控制關聯著青少年偏差行為也引致成人和青年時期輕微犯罪行為的發生，個體自我控制能力更是預測成人犯罪行為，及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重要因子 (LaGrange & Silverman, 1999; Muraven, Pogarsky, & Shmueli, 2006; Perrone, Sullivan, Pratt, & Margaryan, 2004; Piquero,

McDonald, Dobrin, Daigle, & Cullen, 2005; Wright, Caspi, Moffitt, & Silva, 2001)。研究顯示，缺乏父母的監督、照顧和低自我控制有著高度的關連性 (Pratt, Turner, & Piquero, 2004)。Turner、Grindstaff 和 Phillips (1990) 的研究亦指出，學校的社會化功能同樣具有調節自我控制能力發展的效果。換言之，與父母、老師以及同儕的關係與個體低自我控制特質有著關聯，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也有著其影響性。從以上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低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之間具有某一程度的連結 (Pratt & Cullen, 2000)。因此，本研究納入低自我控制以探究其對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關係的影響。

四、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係

國外針對 Agnew 一般化緊張理論已有廣泛的驗證，也確定了緊張因素和偏差行為、犯罪之間的關聯性 (Agnew & White, 1992; Aseltine, Gore, & Gordon, 2000; Baron, 2004; Brezina, 1996; Capowich, Mazerolle, & Piquero, 2001; Hoffman & Miller, 1998; Mazerolle & Piquero, 1998; Mazerolle, Piquero, & Capowich, 2003; Piquero & Sealock, 2000)。但是 Agnew、Brezina、Wright 和 Cullen (2002) 認為，當我們在探究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關聯性時，不能忽略個性層面的特徵，如自我控制、負面情緒、低約束因素，以及偏差同儕的影響效應等 (Agnew & White, 1992)。自我控制理論學者認為低自我控制者在面對不愉快或負面情境時，比較容易以犯罪行為作為達成目的的手段。此外，自我控制理論亦認為擁有偏差同儕以及長時間與偏差同儕相處，係由低自我控制的效應所造成，即低自我控制特質之個體透過偏差同儕的影響，對偏差行為有直接的關係 (McGloin & Shermer, 2009)。Dickman (1993) 的研究即指出低自我控制是偏差同儕影響兒童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因素之一。Agnew 的研究顯示，即使青少年與偏差同儕團體的依附程度不強，但是青少年如果很容易受到偏差同儕團體的壓力，偏差同儕團體仍然對青少年的行為有著影響力，包括偏差和犯罪行為。青少年經常與不良同儕接觸，便容易習得偏差行為的反應模式作為日常生活困擾或不如意事件的對抗，亦會加強青少年本身偏差行為的頻率、強度及持久性。由此推之，青少年即使面對外在的緊張因素，如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等，如果具有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避免接觸偏差同儕，是可減緩偏差行為的發生。換言之，青少年如果遭遇到緊張因素，與偏差同儕高頻率及持續性的接觸，再加上本身低自我控制特質，是極可能增加其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由前述的探討可知，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既可能影響青少年低自我控制，及與偏差同儕的接觸，又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實徵關聯。事實上，國外的一些研究已經發現自我控制 (Agnew et al., 2011; Baron, 2004; Colvin, 2000; Hay & Evans, 2006; Hay & Forrest, 2006; Hitlin & Long, 2009)、接觸偏差同儕 (Agnew & White, 1992; Agnew, 1992, 2001; Kaufman, 2009; Lin et al, 2011) 在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之間的制約效應。然而國內以往有關一般化緊張理論的研究，並未有針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間制約因素影響效應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整合一般化緊張理論、一般化犯罪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探討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困擾、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

對青少年偏差行爲的影響，並納入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控制變項用以檢視各變項之間的關係，嘗試建構一個較具完整性及適合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爲發生的解釋模型。據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

- (一) 確認與父親、母親、同儕及老師的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困擾等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爲的關聯性。
- (二) 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分別與偏差行爲的關聯性。
- (三) 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爲間之相關性影響。
- (四) 建構出一個較具完整性及較為適合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爲發生的一般化緊張理論、自我控制及接觸偏差同儕整合性理論模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抽樣對象為臺灣地區國民中學學生，主要則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首先，第一階段先抽選學校，本研究依照臺灣地區之不同行政區及地理區域為背景，將臺灣地區區分為北部（臺北市、新北市）、中部（臺中市）、南部（高雄市）、東部（臺東市、臺東縣），再由各縣市抽出一所國民中學。接著，第二階段再從各選取調查之學校中，分別針對一、二、三年級，以班級為單位隨機選取群組，而被選出的組群的所有成員皆為樣本，其中各學校班級被抽取的機率皆相等，使樣本的分配接近母體，最終合計總樣本數共 734 名，男性樣本數為 343，女性樣本數為 395；在年級分佈上，1 年級 238 人，佔全體樣本之 32.2%，2 年級 246 人，佔全體樣本之 33.3%，3 年級 254 人，佔全體樣本之 34.4%。

二、研究工具及分析方法

(一) 依變項

本研究之國中生偏差行爲量表，主要參酌許春金、孟維德 (1997) 之「自陳偏差行爲量表」、許春金、馬傳鎮 (1997) 之「大臺北地區少年發展研究問卷 (一)」，以及黃富源 (2000) 之「青少年日常生活量表」修訂而成。此一部分由十九項偏差行爲所構成，包括破壞公物或他人物品、與他人發生性關係、深夜在外遊蕩、辱罵或頂撞師長、攜帶刀械等武器、飆車、抽煙、出入賭博性電玩等不良場所、離家出走、吸毒、打架、放學後流連網咖、賭博、蹺課或逃學、徒手或以武器傷害他人、恐嚇、威脅或勒索他人、參加幫派活動、未經允許而拿走他人的錢財、物品或腳踏車、汽機車、閱讀色情黃色書刊、觀賞影片、網站或光碟等偏差行爲。此量表主要在測量受試者在過去一年內，是否曾經從事或發生上述偏差行爲，計分方式採四點量表，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從未（0 次）、很少（1 次）、偶爾（2-5 次）、經常（6 次以上），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4；得分愈高，表示其愈常從事偏差行爲，此十九個項目所建構之國中生青少年偏差行爲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5。

(二) 自變項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陳問卷方式蒐集資料。本研究各變項之測量，主要依據緊張理論、自我控制理論及接觸偏差同儕之相關觀點發展而來，故屬於內容效度的檢定方式，當某些概念涵蓋不同向度時，則以構念效度方法檢驗之。至於信度測量方面，則以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加以檢視。

1. 緊張因素

主要參考董旭英 (2003) 之社會緊張量表及黃家珍 (1999) 之負面生活事件量表，本研究發展並區分為與他人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日常生活困擾等三類，以下分別說明：

1-1 與他人負面關係

本研究以施測回收之資料，採取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 (direct oblimin) 進行因素分析，保留特徵值大於 1 且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50 的題項，以剔除因素負荷值較低的題目，進而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因素分析結果為與他人負面關係變項包括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等四個構面，茲分述如下：

(1) 與父親負面關係

包括父親不了解我；父親在家中常常打我、罵我；就算我再怎麼努力表現，還是得不到父親的歡心；父親並不尊重我的意見；與父親發生衝突；我在父親眼中是個壞小孩等六題，以四點量表測量，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非常不符合者給 1 分，不符合者給 2 分，符合者給 3 分，非常符合給 4 分；總得分愈高，表示受訪者與父親負面關係愈高。此六個項目所建構之與父親負面關係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0。

(2) 與母親負面關係

包括母親不了解我；母親在家中常常打我、罵我；就算我再怎麼努力表現，還是得不到母親的歡心；母親並不尊重我的意見；與母親發生衝突；我在母親眼中是個壞小孩等六題，以四點量表測量，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非常不符合者給 1 分，不符合者給 2 分，符合者給 3 分，非常符合給 4 分；總得分愈高，表示受訪者與母親負面關係愈高。此六個項目所建構之與母親負面關係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0。

(3) 與老師負面關係

包括老師並不尊重我的意見；老師交付的作業太繁重；老師不了解我；不管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老師的肯定等四題，以四點量表測量，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非常不符合者給 1 分，不符合者給 2 分，符合者給 3 分，非常符合給 4 分；總得分愈高，表示受訪者與老師負面關係愈高。此六個項目所建構之與老師負面關係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74。

(4) 與同儕負面關係

由我覺得沒有同學瞭解我、喜歡我；我覺得同學很難相處；在班級中，我常被別人嘲笑；我沒有什麼可以傾吐心聲的好朋友；不管我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同學或朋友的肯定等五題組成，以四點量表測量，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非常不符合者給 1 分，不符合

者給 2 分，符合者給 3 分，非常符合給 4 分；總得分愈高，表示受訪者與同儕負面關係愈高。此六個項目所建構之與同儕負面關係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0。

1-2 負面生活事件

由失戀；好朋友去世；好朋友分開或失去聯絡；父母分居或離婚；父親或母親與他人同居；家人去世；發生嚴重意外事故（如車禍）；父親或母親失業；家中經濟發生困難或負債等九題組成。以上答項包括「在過去一年內曾發生」及「未曾發生」，並依據發生與否計分，在過去一年內曾發生者給 1 分，未曾發生者給 0 分，意即負向生活事件變項所取的值為 1 時，受訪者曾於一年內遭逢至少一種上述負向生活事件。由於負面生活事件的發生並不存在關聯性，故不需考驗其內部一致性。

1-3 日常生活困擾

包括我覺得自己的外表沒有吸引力；大人總是忽略我的意見；遇到挫折時，無法找到適當的發洩方法；覺得生活中許多問題，沒有能力解決；覺得生活枯燥、煩悶等五題。以四點量表測量，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非常不符合者給 1 分，不符合者給 2 分，符合者給 3 分，非常符合給 4 分；總得分愈高，表示受訪者日常生活困擾愈高。此五個項目所建構之日常生活困擾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77。

2. 接觸偏差同儕

依據 Sutherland (1947)、范國勇 (2001)，以及張楓明 (2006) 之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問卷，建構出下列五項題目做為測量國中生之接觸偏差同儕情形，包括經常逃學或蹺課的朋友；曾有違法行為而進出警察局的朋友；曾經打過群架（或集體械鬥）的朋友；曾經逃家或離家出走的朋友；已經輟學的朋友等題項。以五點量表測量，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 0 位得 1 分、1-2 位得 2 分、3-5 位得 3 分、6-10 位得 4 分，以及 11 位以上得 5 分。回答人數愈多者代表其接觸偏差行為的友伴愈多，此五個項目所建構之接觸偏差同儕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6。

3. 低自我控制

參考陳慧如 (2004) 之自我控制量表作為測量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的工具，其主要依據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1990) 的一般化犯罪理論編製而成。包括我容易因一時氣憤而犯下錯誤；我經常被人說成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受到刺激時，我就會立即行動而不會停下來想一想；我是個性容易衝動的人；我很難專心完成一件事件；有些事情違反了校規，但我仍然忍不住要去做；我曾受不了外界的誘惑，而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等七題。採四點量表，回答非常不符合者給 1 分，不符合者給 2 分，符合者給 3 分，非常符合給 4 分；總得分愈高，表示受訪者低自我控制傾向的程度愈高。此七個項目所建構之低自我控制指標測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2。

(三) 控制變項

由於個人屬性變項可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或扭曲。故本研究擬納入個人特質及家庭背景作為控制變項。檢視當納入這些控制變項後，自變項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之關係是

否產生變化，藉以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分析例子，並檢驗自變項和依變項間是否存在假性相關。

1. 性別：分別為男性取值為 1，女性取值為 0。
2. 年級：分別為七年級取值為 1，八年級取值為 2，九年級取值為 3。
3. 父母教育程度：
 - (1) 父親教育程度：從不識字至研究所以上分為七個等級。不識字給 1 分，研究所給 7 分，值愈高表示其父親教育程度愈高。
 - (2) 母親教育程度：從不識字至研究所以上分為七個等級。不識字給 1 分，研究所給 7 分，值愈高表示其母親教育程度愈高。
4. 家庭經濟狀況：詢問受測者覺得家裡的經濟情況和一般家庭比較程度，屬於從下到上分為五個等級。其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5，值愈高代表家庭經濟狀況愈好。

三、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來檢視各變項之分佈情形；再由相關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統計方法分析各變項與偏差行為間的關聯性；最後則以巢式迴歸模型 (nest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分析技術建構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困擾、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解釋模型，共包括七個模型組；模型一先置入緊張因素的六個次變項 — 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困擾；模型二中，放進接觸偏差同儕。在模型三中，置入低自我控制變項；模型四則納入緊張因素的六個次變項及接觸偏差同儕變項，藉此檢視接觸偏差同儕對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之關係的影響力；模型五則納入緊張因素的六個次變項及低自我控制變項，藉此檢視低自我控制對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之關係的影響力；模型六則同時納入緊張因素的六個次變項、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變項，藉此檢視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對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之關係的影響力；模型七則再置入緊張因素的六個次變項、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及控制變項效應 (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

肆、研究結果

一、各變項之描述性資料分析

從表 1 可以瞭解本研究所包含之各變項的數值分佈情形及平均值狀況，於此主要就依變項及各自變項作說明。首先，就偏差行為之統計概況而言，由表 1 可知，整體而言，受試者從事偏差行為次數不多。以其圖形分配狀況來看，呈現正偏態及高狹峰 (leptokurtic) 情形，也就是說，國中生偏差行為之分布較為集中，在次數低的一方，亦即未從事偏差行為之人數較多。因此，為考慮迴歸模式中，依變項應符合常態分配性原則，故本研究將此依

變項取對數處理，對數值 (log) 為 10，將國中生偏差行為常態化 (normalization)。在自變項方面，緊張因素之與父親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92，與母親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90，與老師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2.09，與同儕負面關係平均數為 1.76，負面生活事件平均數為 .87，日常生活困擾平均數為 2.37；其次，接觸偏差同儕平均數為 1.37；最後，低自我控制平均數為 2.31。

表 1 國中生各變項描述性統計分析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態	峰度
依變項						
偏差行為	1.16	.30	1.00	3.74	3.30	15.09
常態化後之偏差行為	.05	.09	.00	.57	2.22	5.45
自變項						
與父親負面關係	1.92	.60	1.00	4.00	.56	.01
與母親負面關係	1.90	.60	1.00	4.00	.59	.17
與老師負面關係	2.09	.60	1.00	4.00	.51	.50
與同儕負面關係	1.76	.58	1.00	4.00	.71	.74
負面生活事件	.87	.33	.00	1.00	-2.24	3.03
日常生活困擾	2.37	.67	1.00	4.00	-.04	-.27
接觸偏差同儕	1.37	.61	1.00	5.00	2.55	7.48
低自我控制	2.31	.59	1.00	4.00	.18	.17

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情形

表 2 呈現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困擾等緊張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與國中生偏差行為間之相關分析。由初步的相關分析結果可知，與父親負面關係、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日常生活困擾、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呈現統計上顯著正相關 ($r = .23$ 、 $.27$ 、 $.25$ 、 $.08$ 、 $.16$ 、 $.16$ 、 $.53$ 、 $.31$)，亦即青少年與父親、母親、老師及同儕的負面關係愈高、負面生活事件愈多、日常生活困擾愈高、接觸偏差同儕愈頻繁、低自我控制程度愈高，則其愈可能發生偏差行為。

另外，亦值得注意的是，緊張因素的各個變項與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間之關聯性均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亦即接觸偏差同儕愈頻繁、自我控制能力愈低的國中生，其與父母親、老師及同儕的關係愈負面；至於接觸偏差同儕與低自我控制之關聯性，亦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言之，愈低自我控制的國中生，愈容易接觸到偏差同儕。然而，相關係數只能顯示變項間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時的相關程度，故僅作為進行迴歸分析時的初步依據。因此，以下使用巢式迴歸分析方法，進一步檢驗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影響，以提供一較精確的實證檢驗依據。

表 2 變項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 青少年偏差行為	1								
2. 與父親負面關係	.23***	1							
3. 與母親負面關係	.27***	.84***	1						
4. 與老師負面關係	.25***	.35***	.34***	1					
5. 與同儕負面關係	.08*	.27***	.26***	.29***	1				
6. 負面生活事件	.16***	.07	.07	.01	-.01	1			
7. 日常生活困擾	.16***	.44***	.41***	.32***	.24***	.09*	1		
8. 接觸偏差同儕	.53***	.25***	.26***	.24***	.11**	.09*	.11**	1	
9. 低自我控制	.31***	.35***	.34***	.26***	.17***	.08*	.42***	.20***	1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與國中生偏差行為關聯性

表 3 呈現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與國中生偏差行為之巢式迴歸模型分析結果，並分述如下：

(一) 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對偏差行為的影響

由表 3 可知，模型一主要在檢視緊張因素變項與偏差行為的關聯性。其分析結果發現，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B = .03$ 、 $p < .001$ ； $B = .03$ 、 $p < .001$ ； $B = .04$ 、 $p < .001$)，與父親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日常生活困擾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 > .05$)；即國中生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各每增加一個單位，國中生偏差行為增加 .03、.03 與 .04 個單位。本模型之決定係數 (R^2) 為 .13，意即緊張因素變項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3%。模型二主要在瞭解接觸偏差同儕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聯性。分析結果發現，接觸偏差同儕對國中生偏差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B = .08$ 、 $p < .001$)；即接觸偏差同儕每增加一個單位，國中生偏差行為增加 .08 個單位。模型二之決定係數 (R^2) 為 .28，也就是說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28%。模型三檢視低自我控制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聯性。分析結果發現，低自我控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B = .05$ 、 $p < .001$)；即國中生低自我控制每增加一個單位，國中生偏差行為增加 .05 個單位。模型三之決定係數 (R^2) 為 .10，也就是說低自我控制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0%。

(二) 接觸偏差同儕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的影響

由表 3 模型四可知，在納入接觸偏差同儕變項後，緊張因素的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仍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B = .02$ 、 $p < .01$ ； $B = .02$ 、 $p < .01$ ； $B = .03$ 、 $p < .001$)，且接觸偏差同儕亦達到顯著正向效應 ($B = .07$ 、 p

< .001)，而與父親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日常生活困擾仍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 > .05$)。表示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接觸偏差同儕各每增加一個單位，國中生偏差行為增加 .02、.02、.03 與 .07 個單位。另外，緊張因素在加入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後，並未改變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的影響。本模型之決定係數 (R^2) 為 .32，亦即緊張因素及接觸偏差同儕變項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32%。

表 3 青少年偏差行為巢式迴歸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B) 分析模式 (N=734)

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七之一
自變項								
緊張因素								
與他人負面關係								
與父親負面關係	-.01			-.01	-.01	-.01	-.01	-.01
與母親負面關係	.03***			.02**	.03**	.02*	.02*	.05***
與老師負面關係	.03***			.02**	.02***	.01**	.01*	.01**
與同儕負面關係	-.01			-.01	-.01	-.01	-.01*	.02*
負面生活事件	.04***			.03***	.04***	.03***	.03***	.03***
日常生活困擾	.01			.01	-.01	-.01	.01	.01
接觸偏差同儕		.08***		.07***		.07***	.06***	.06***
低自我控制			.05***		.03***	.03***	.02***	.02***
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								.01***
控制變項								
年級							.01	.03
性別(男=1;女=0)							.03***	.01***
父親教育程度							.01	-.01
母親教育程度							-.01	.01
家庭經濟情況							-.01*	-.01
常數	-.09***	-.05***	-.05***	-.13***	-.13***	-.15***	-.07**	-.25***
決定係數 (R^2)	.13	.28	.10	.32	.17	.35	.39	.40
調整後 (adjust R^2)	.12	.28	.09	.32	.16	.34	.38	.39
F 檢定	17.58***	283.22***	76.91***	49.42***	20.95***	48.10***	34.78***	33.71***

註：* 表示 $p < .05$ ；**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1$ ；VIF<3.6

(三) 低自我控制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的影響

由表 3 模型五發現，緊張因素在加入低自我控制的效應後，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仍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B = .03$ 、 $p < .01$ ； $B = .02$ 、 $p < .001$ ； $B = .04$ 、 $p < .001$)，低自我控制亦具有顯著正向效應 ($B = .03$ 、 $p < .001$)。換言之，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及低自我控制各每增加一個單

位，國中生偏差行為增加 .03、.02、.04 與 .03 個單位。同樣地，與父親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日常生活困擾仍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 > .05$)。亦即緊張因素在置入低自我控制變項後，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的效應並未受到影響。模型五之決定係數 (R^2) 為 .17，亦即緊張因素及低自我控制變項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17%。

(四) 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的影響

從表 3 模型六可知，在同時置入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變項，緊張因素的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仍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B = .02$ 、 $p < .05$ ； $B = .01$ 、 $p < .05$ ； $B = .03$ 、 $p < .001$)，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亦達到統計上顯著正向效應 ($B = .07$ 、 $p < .001$ 、 $B = .03$ 、 $p < .001$)，表示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各每增加一個單位，國中生偏差行為增加 .02、.01、.03、.07 與 .03 個單位。此外，與父親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日常生活困擾仍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 > .05$)。換言之，緊張因素在加入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的影響後，並未改變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的影響。模型六之決定係數 (R^2) 為 .35，亦即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變項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35%。

最後，於表 3 模型七再加入年級、性別、父親及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控制變項，以探討各自變項與偏差行為影響力的變化情形。由模型七可知，性別 ($B = .03$ 、 $p < .001$)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男性國中生比女性國中生有較多的偏差行為；家庭經濟狀況 ($B = -.01$ 、 $p < .05$) 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家庭經濟狀況愈高有著較少的偏差行為；年級、父親及母親教育程度對國中生偏差行為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p > .05$)。進一步檢視納入年級、性別、父親及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控制變項後的變化，緊張因素的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仍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B = .02$ 、 $p < .05$ ； $B = .01$ 、 $p < .05$ ； $B = .03$ 、 $p < .001$)；但有趣的是增加了與同儕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負向效應 ($B = -.01$ 、 $p < .05$)；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仍然達到統計上顯著正向效應 ($B = .06$ 、 $p < .001$ 、 $B = .02$ 、 $p < .001$)，與父親負面關係及日常生活困擾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 > .05$)。模型七之決定係數 (R^2) 為 .39，即表示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年級、性別、父親及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變項對偏差行為的解釋力約為 39%。

就模型七分析結果而言，與同儕負面關係與偏差行為呈現負關係，但在回顧表 2 相關矩陣分析，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時，與同儕負面關係與偏差行為達統計上顯著正向效應。但在表 3 模型七之迴歸分析中納入所有自變項及控制變項的效應後，與同儕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預測方向由正轉為負，其迴歸模型分析之 $VIF < 3.60$ ，故排除多重共線性之問題 (Myers, 1990)；根據譚子文、董旭英、葉雅馨 (2010) 的研究，當我們在解釋一個自變項影響依變項的效應之際，同時必須考慮到另一個自變項的效應時，其間可能具有交互作用效應 (interaction effects)，董旭英 (2007:328-329) 也明確指出，在使用巢式迴歸檢視交互作用效應時，應注意二種可能性，其一可能存在著共線性問題，必須檢核 VIF 值是否大於 10，另一可能是其中存在著交互作用效應。據此，本研究推論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

低自我控制及控制變項之間可能具有交互作用效應存在，但究竟是哪些自變項間的關係對依變項的影響力產生交互作用效應，則使用巢式迴歸模組分析逐一檢視各變項間的關係對依變項的影響力是否產生交互作用效應。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間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具交互作用之效應存在，故將其呈現於由模型七所延伸而出的模型七之一（參見表 3），其分析結果顯示，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以及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的交互作用項、性別對國中生偏差行為具有顯著正向效應 ($B = .05$ 、 $p < .001$ ； $B = .01$ 、 $p < .01$ ； $B = .03$ 、 $p < .001$ ； $B = .06$ 、 $p < .001$ 、 $B = .02$ 、 $p < .001$ ； $B = .01$ 、 $p < .001$ ； $B = .01$ 、 $p < .001$)；與父親負面關係、日常生活困擾及家庭經濟狀況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p > .05$)；但是與同儕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預測方向則由負轉為正，換言之，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預測，存在著交互作用。本研究再以圖示的方法，進一步探討上述之三階交互作用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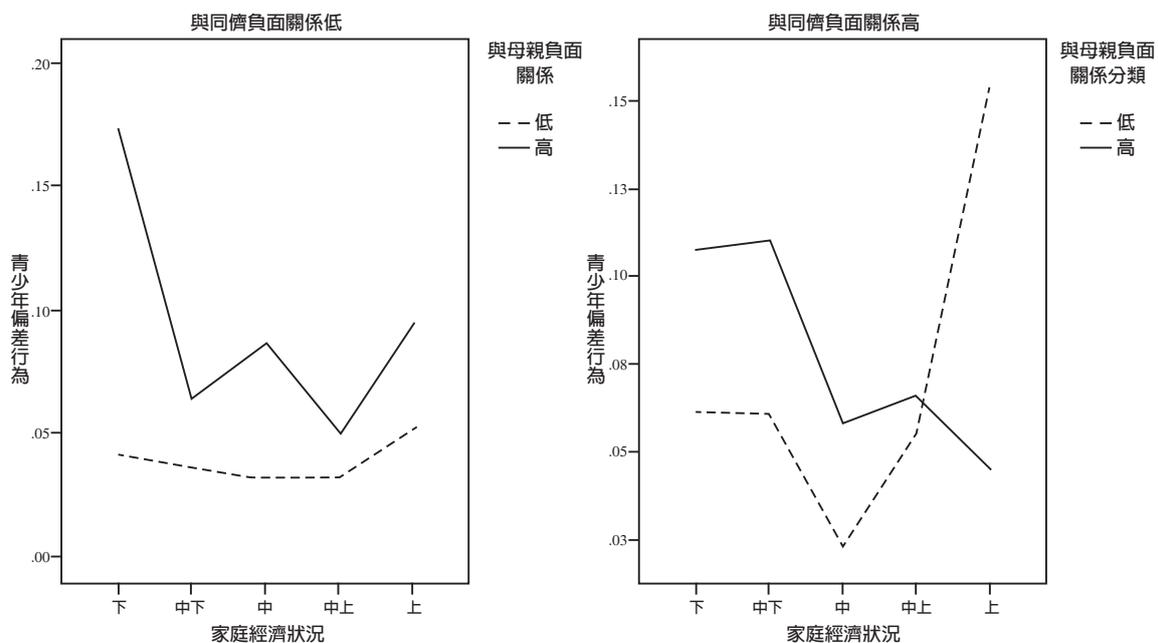


圖 1 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交互作用效應

圖 1 將青少年偏差行為作為 Y 軸，而家庭經濟狀況作為 X 軸，再以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平均數為基準，各劃分為高低兩組，分別獲得兩條迴歸預測線。從圖 1 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交互作用效應可知，當青少年與同儕負面關係低時，與母親負面關係高者，有著較高的偏差行為；但是隨著家庭經濟狀況提高，不論與母親負面關係程度如何，二者偏差行為均會因此而減少，但是當家庭狀況達到中上時，反而會增加偏差行為發生的次數。其次，在青少年與同儕負面關係高方面，與母親負面關係高者，相較於與母親負面關係低者，有著較高的偏差行為。然而家庭經濟狀況的提升，可緩和與母親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但是當家庭經濟狀

況達到中等時，不論與母親負面關係如何，其偏差行為反而呈現增加的情形，尤其在與母親負面關係低者更是呈現急劇升高的情形；當家庭經濟狀況來到中上時，與母親負面關係高者，其偏差行為再度減少。進一步由圖 1 觀察發現，家庭經濟狀況中上，在與同儕、母親負面關係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上，可謂是一個分界點。研究結果意味著，在預測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對青少年之偏差行為的影響時，家庭經濟狀況、與父母、同儕的負面關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此三者間是種動態而複雜的互動關係。

伍、結論與建議

由上述的研究分析可得知，部分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變項與國中生偏差行為存在著顯著的關聯性。以下就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係提出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一) 緊張因素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係

從分析結果可知，緊張因素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聯性，係以與母親、老師的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偏差行為具有影響效應（參見表 3，模型一），從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參見表 2），在不考慮其他條件或因素的同時效應時，與父親及同儕的負面關係、日常生活困擾與偏差行為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亦即與父親及同儕關係愈負面，日常生活困擾愈多，國中生從事偏差行為的次數愈多。但在同時納入各個緊張因素變項後，與父親、同儕負面關係及日常生活困擾與偏差行為則不具相關性，顯示與父親、同儕負面關係及日常生活困擾，對於國中生偏差行為發生的效應，已被與母親、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元素所吸納，所以在納入與母親、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變項後，與父親、同儕負面關係及日常生活困擾的效應隨之消失。此一結果可能隱含著與父親、同儕負面關係及日常生活困擾對國中生偏差行為的影響，事實上建構在與母親及老師的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上，即與父親、同儕負面關係及日常生活困擾的影響力，主要是來自於孩子與母親、老師的負向關係及所遭遇到的負向事件之效應。換言之，母親、老師對孩子的接納、認同、關愛等正向關係，或當孩子在面對負面生活事件時，給予關懷、支持，是可抑制其在面臨緊張因素而產生的壓力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亦可減緩與父親、同儕之負面關係及日常生活困擾對偏差行為所帶來的正面衝擊。

(二) 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與國中生偏差行為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發生具有影響效應，此一結果顯示，儘管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同儕朋友中曾經逃家、蹺課或械鬥等偏差行為的人數甚低（參見表 1，接觸偏差同儕平均數 1.37），但偏差同儕對於國中生偏差行為的影響力仍不容輕忽。其次，

低自我控制對國中生偏差行爲的發生亦具有影響效應，也就是說國中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愈低，偏差行爲發生的機率愈高，符應衆多有關一般化犯罪理論驗證青少年偏差行爲的結果 (LaGrange & Silverman, 1999; Perrone et al., 2004; Wright et al., 2001)。

(三) 接觸偏差同儕對緊張因素與國中生偏差行爲的關係

從表 3 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納入接觸偏差同儕的效應之後，緊張因素的與母親、老師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與接觸偏差同儕，與國中生偏差行爲仍具有正向效應。換言之，對於國中階段的青少年而言，與母親、老師的關係不佳及負面生活事件的發生，再加上與偏差同儕的接觸，是可能加速偏差行爲的發生。其次，國中生的緊張因素在加入接觸偏差同儕的效應後，其解釋變異量由 13% 增加到 32% (R^2 改變量 = .32, F 改變 = 49.42, $p < .001$)，可知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行爲的影響，大於緊張因素。這意味著國中生接觸偏差同儕對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爲間關聯性的影響，扮演著具意義角色 (參見表 3，模型四)。

(四) 低自我控制對緊張因素與國中生偏差行爲的關係

由模型五之研究結果呈現，國中生如果與母親及老師的負面關係愈高、負面生活事件愈多與低自我控制程度愈高，其偏差行爲發生次數愈多。換言之，國中生若無法維繫與母親正向、良性互動、溝通的關係，及老師的肯定、認同及接納，再加上無法有效化解或處理如父母分居或離婚、好朋友分開或失去聯絡、失戀、家中經濟發生困難或負債等負面事件的影響，若又具有低自我控制的特質，其發生偏差行爲的機會愈高。綜上而論，以往雖未有緊張因素、低自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爲的相關研究，但本研究發現在緊張因素中納入低自我控制，結果顯示具此特質者會有較多的偏差行爲。研究結果呈現，若是能培養青少年自我控制的能力，則在其面臨緊張因素時將不致增加偏差行爲的發生，且避免國中生陷落於負向母子及師生關係，並設法減少其遭逢負面生活事件均可降低偏差行爲的發生。

(五) 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對緊張因素與國中生偏差行爲的關係

從表 3 模型六迴歸分析結果可知，當加入接觸偏差同儕及低自我控制效應後，國中生與母親和老師的負面關係愈高、負面生活事件愈多、與偏差同儕的高密切接觸，及本身的低自我控制特質，愈容易產生偏差行爲。就整體分析結果而言，與母親負面關係、與老師負面關係、與同儕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接觸偏差同儕、低自我控制、性別及家庭經濟狀況，在解釋國中生偏差行爲的發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亦即當國中生與同儕負面關係低，與母親及老師的關係愈負向，日常生活負向事件發生越多，接觸偏差同儕愈多，又具有低自我控制特質時，愈可能發生偏差行爲，且男生、家庭經濟狀況愈差，其發生偏差行爲的次數愈多；進一步由交互作用效應審視，當我們不考慮國中生與同儕負面關係的程度如何時，與母親負面關係高者其偏差行爲發生機會愈大，隨著家庭經濟狀況提高，不論與母親負面關係程度如何，偏差行爲均會因此而減少；當家庭狀況達到中上時，與同儕負面關係高但與母親負面關係低者，反而會增加偏差行爲發生的次數。由此審之，家庭經濟狀

況在國中生與母親、同儕負面關係與偏差行為間，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收入越高是否意味著青少年成長過程中主要照顧者的母親，在看到孩子與同儕的人際關係不佳、相處不融洽時，為安撫、彌補孩子的挫折感，以及產生的負面情緒，給予過多的物欲或對其行為的縱容，反而將孩子推向偏差行為，頗有待更進一步之驗證。

二、建議

- (一)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與母親、老師負面關係及負面生活事件對國中生的偏差行為有顯著預測力。顯示當國中生無法獲得母親關愛、包容與接納，在學校裡老師的疏遠、拒絕，遭遇較多的失落、分離等不期望的生活事件時，若是無法有效調適，尋求協助與溝通，適時予以輔導，排解不當的情緒，容易因負面關係及生活事件所帶來的不愉快經驗，藉由偏差行為來宣洩或減輕。因此，學校教育應適時介入及輔導國中生如何地面對生活中的挫折，以適當的方式抒解、宣洩生活負面刺激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母親則應主動積極去關心子女的心情與感受，注意與子女情感的聯繫，幫助子女解決他們所遇到的問題以抑制偏差行為發生的機率。
- (二) 從研究結果可知，具低自我控制特質及與偏差同儕頻繁的接觸，是造成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原因之一。故對於國中階段之青少年，要緩減個人低自我控制對偏差行為的影響，父母、師長及學校輔導人員應思考如何強化青少年之對自我的認同及自信，培養正向的自我概念；在接觸偏差同儕方面，應密切注意其同儕交往情形，使能在均衡之同儕關係下，建立拒絕偏差同儕的勇氣，勇於向他們說不，並配合正向經驗的機會創造與結果肯定，以提升其自我控制能力。
- (三) 本研究亦發現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負面關係及與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預測，存在著交互作用。由結果可知，家庭經濟狀況是預測國中生是否發生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國中生之家庭經濟狀況達到中上時，儘管與母親的負面關係較低，但與同儕的高負面關係，其偏差行為仍會較嚴重，這是父母及學校相關人員應有所瞭解及加以關心。
- (四) 在未來研究上，建議日後相關研究者可繼續探討家庭經濟狀況、與母親及同儕負面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之交互作用效應，以瞭解其中交互組合之複雜關係。此外，由於本研究係針對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高雄市、臺東市、臺東縣等縣市國民中學抽樣，其結果的推論有其侷限性，在解釋上應更加謹慎。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淑女(1994)。家庭暴力對青少年暴力及犯罪行為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68，191-209。
- 江靜宜(2009)。別急著扶起孩子：談青少年的挫折容忍力。家庭教育雙月刊，17，51-57。
- 吳芝儀(2000)。中輟生的危機與轉機。臺北：濤石。

- 許春金、馬傳鎮 (1997)。少年偏差行為早年預測之研究—第一年研究報告。臺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許春金、孟維德 (1997)。家庭、學校、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0，225-256。
- 許春金 (2010)。犯罪學。臺北：五南。
- 范國勇 (2001)。少年偏差行為理論整合之預測模式。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2，75-100。
- 陳慧如 (2004)。自我控制、青少年自我中心與偏差行為之關係。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淑娟 (2008)。叛逆十五、二十時：談青少年的壓力與調適。家庭教育雙月刊，15，47-56。
- 張楓明 (2006)。社會控制理論之「參與」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抑制性之實證研究。犯罪學期刊，9(2)，69-96。
- 黃家珍 (1999)。緊張與少年偏差行為：Agnew 一般緊張理論之實證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 黃富源 (2000)。少年暴力犯罪相關因素之研究—家庭結構、動力與社會學習觀點以論。臺北：行政院行政院青少年導委員會。
- 黃芳銘、楊金寶、許福生 (2002)。在學青少年生活痛苦指標發展之研究。師大學報：教育類，50(2)，97-119。
- 葉在庭 (2001)。青少年行為調適、焦慮、社會支持及生活事件與自殺意念的關係。中華輔導學報，10，151-178。
- 廖經臺 (2002)。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家庭因素分析。社會科學學報，1，29-41。吳武典 (1992)。偏差行為的診斷與輔導。現代教育，7(25)，17-26。
- 董旭英 (2003)。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證性檢驗。犯罪學期刊，6(1)，103-128。
- 董旭英 (2007)。偏差及犯罪行為研究之模組建立—巢式迴歸模式之應用。載於沈勝昂、林明傑、周憐嫻、孟維德、侯崇文、陳玉書、許春金、曾淑萍、黃富源、黃翠紋、黃蘭瑛、楊士隆、董旭英、鄭昆山、鄭瑞隆、謝文彥、戴伸峰 (2007) 之刑事司法與犯罪學研究方法，317-338 頁。
- 譚子文、董旭英、葉雅馨 (2010)。社會緊張因素與臺灣大學生內化適應問題關聯性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8，147-190。
- 譚子文、范書菁 (2010)。依附關係、參與傳統活動、社會緊張因素與臺灣地區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及內向性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2(1)，17-42。

二、英文部分

Agnew, R., & White, H. R. (1992).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 30(4), 475-499.
- Agnew, R. (1995).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psychological strain theory to the explanation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In The Legacy of Anomie Theory: Advance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Vol. 6. eds F. Adler & W. S. Laufer.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Agnew, R., & Brezina, T. (1997). Relational problems with peers, gender, and delinquency. *Youth and Society*, 29(1), 84-111.
- Agnew, R. (2001).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Specifying the types of strain most likely to lead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8(4), 319-361.
- Agnew, R., Brezina, T., Wright, J. P., & Cullen, F. T. (2002). Strai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elinquency: Extend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40(1), 43-72.
- Agnew, R. (2006). *Pressured into crime: An overview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 Agnew, R. (2009). General Strain Theory. *Handbooks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2, 169-185.
- Agnew, R., Scheuerman, H., Grosholz, J., Isom, D., Watson, L., & Thaxton, S. (2011). Does victimization reduce self-control?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9(2), 169-174.
- Akers, R. L., Krohn, M. D., Lanza-Kaduce, L., & Radosevich, M. (1979). Social learning and deviant behavior: A specific test of a gener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4), 636-655.
- Akers, R. L. (1985). *Deviant Behavior: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Wadsworth, Belmont, CA.
- Akers, R. L. (1997).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CA: Roxbury Press.
- Akers, R. L., & Sellers, C. S. (2009).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seltine, R. H., Gore, S., & Gordon, J. (2000). Life stress, anger and anxiety delinquency: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1(3), 256-275.
- Bandura, A. (1973). *Aggression: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aron, S. W. (2004). General strain, street youth and crime: A test of Agnew's revised theory. *Criminology*, 42(2), 457-483.
- Brezina, T. (1996). Adapting to strain: An examination of delinquent coping responses. *Criminology*, 34(1), 39-60.
- Brezina, T. (1998). Adolescent maltreatment and delinquency: The question of intervening process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5(1), 71-99.

- Broidy, L., & Agnew, R. (1997). Gender and crime: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4(3), 275-306.
- Broidy, L. (2001). A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39(1), 9-35.
- Buunk, A. P., & Gibbons, F. X. (2007).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in a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New direct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2(1), 109-125.
- Burgess, R. L., & Akers, R. L. (1966). A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reinforcement theory of criminal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14(2), 128-147.
- Capowich, G. E., Mazerolle, P., & Piquero, A. (2001). General strain theory, situational anger, and social networks: An assessment of conditioning influence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9(5), 445-461.
- Carson, D. C., Sullivan, C. J., Cochran, J. K., & Lersb, K. M. (2009). General strain the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victimization and drug Use. *Deviant Behavior* 30(1), 54-88.
- Colvin, M. (2000). *Crime & coercion: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chronic criminal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ottfredson, M. R., & Hirschi, T.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 C., & Evans, M. M. (2006). Violent victimiz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delinquency: Examining predictions from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4(3), 261-274.
- Hay, C., & Forrest, W.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self-control: Examining self-control theory's stability thesis. *Criminology*, 44(4), 739-774.
- Higgins, G. E., & Boyd, R. J. (2008). Low self-control and deviance: Examining the moderation of social support from parents. *Deviant Behavior*, [http://www.informaworld.com/smpp/title~db=all~content=t713394036~tab=issueslist~branches=29 - v2929\(4\)](http://www.informaworld.com/smpp/title~db=all~content=t713394036~tab=issueslist~branches=29-v2929(4)), 388-410.
- Hitlin, S., & Long, C. (2009). Agency as a sociological variable: A preliminary model of individuals, situations, and the life course. *Sociology Compass*, 3(1), 137-160.
- Hoffman, J. P., & Su, S. S. (1997).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stress on delinquency and drug use: A strain theory assessment of sex differenc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4(1), 46-78.
- Hoffman, J. P., & Miller, A. S. (1998). A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4(3), 83-110.
- Hoffman, J. P., Cerbone, F. G., & Su, S. S. (2000). A growth curve analysis of stress and adolescent drug use. *Substance Use & Misuse*, 35(5), 687-716.

- Kaufman, J. M. (2009). Gendered responses to serious strain: The argument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deviance. *Justice Quarterly*, 26(3), 410-444.
- LaGrange, T. C., & Silverman, R. A. (1999). Low self-control and opportunity: Testing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s an explanation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7(1), 41-72.
- Lau, R. R., Qudarel, M. J., & Hartman, K. A. (1990).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young adults' preventive health beliefs and behavior: Influence from parents and peer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1(3), 240-259.
- Lin, W. H., Cochran, J. K., & Mieczkowski, T. (2011). Direct and vicarious violent victimiza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n applic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Sociological Inquiry*, 81(2), 195-222.
- Mazerolle, P., & Piquero, A. R. (1998). Linking exposure to strain with anger: An investigation of deviant adaptation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6(3), 89-101.
- Mazerolle, P., Piquero, A. R., & Capowich, G. E. (2003). Examining the links between strain,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anger and crime: Further specifying and test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Youth & Society*, 35(2), 131-157.
- McGloin, J. M., & Shermer, L. O. (2009). Self-Control and Deviant Peer Network Structur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6(1), 35-72.
- Muraven, M., Pogarsky, G., & Shmueli, D. (2006). Self-control depletion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2(3), 263-277.
- Myers, R. H. (1990). *Classical and modern regression with applications* (2nd ed.), Boston: Duxbury Press.
- Perrone, D., Sullivan, C., Pratt, T., & Margaryan, S. (2004). Parental efficacy, self-control, and delinquency: A tes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y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8(3), 298-312.
- Piquero, N. L., & Sealock, M. D. (2000). Generalizing general strain theory: An examination of an offending population. *Justice Quarterly*, 17(3), 449-484.
- Piquero, A. R., MacDonald, J., Dobrin, A., Daigle, L. E., & Cullen, F. T. (2005). Self-control, violent offending, and homicide victimization: Assessing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1(1), 55-71.
- Pratt, T. C., & Cullen, F. T. (2000).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Gottfredson and Hirschi's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A meta-analysis. *Criminology*, 38(3), 931-964.
- Pratt, T. C., Turner, M. G., & Piquero, A. R. (2004). Parental socialization and community contex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sources of low self-contro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1(3), 219-243.

- Rhodes, J. E., & Jason, L. A., (1990). A social stress model of substance abus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8(4), 395-401.
- Robert, H. A., Susan, G., & Jennifer, G. (2000). Life stress, anger and anxiety, and delinquency: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1(3), 256-275.
- Sutherland, E. H. (1947).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4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 Thornberry, T. P., & Krohn, M. D. (1997). Peers, drug use, and delinquency. In D. M. Stoff, J. Breiling, & J. D. Maser (Eds.), *Handbook of antisocial behavior* (pp. 218-233). New York: Wiley.
- Turner, R., Grindstaff, C., & Phillips, N. (1990). Social support and outcome in teenage pregnanc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1(1), 43-57.
- Warr, M. (2002). *Companions in Crim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s, T. A., Vaccaro, D., & McNamara, G. (1992). The role of life events, family support, and competence i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A test of vulnerability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3), 349-374.
- Wright, B. R. E., Caspi, A., Moffitt, T., & Silva, P. A. (2001). The effects of social ties on crime vary by criminal propensity: A life-course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Criminology*, 39(2), 321-348.